

師大地理研究報告 第40期 民國93年5月
Geographical Research No. 40, May, 2004

台北地區漢人聚落拓墾與地形之相關研究 *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n Chinese Settlement Development and Landforms in Taipei Area

張政亮 *1
Cheng-Liang Chang

鄧國雄 *2
Kou-Hsiung Teng

吳健蘭 *3
Chien-Lan Wu

Abstract

People used to choose their settlement sites with special regard to geomorphic conditions. Those sites mostly located at riversides, terraces, fans, and basins. As a result, the location of settlement revealed both resource depending and the interaction with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history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s, some settlements were already founded in Keelung, Tanshui and the north coast by Spanish and Han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17 century. Then the Han Chinese followed the aborigines' steps and came into Taipei Basin from the estuary of the Tanshui River. Under the threaten of floods and the Plain-Tribes, the Han Chinese expanded their territory from the west of basin to the east gradually and the settlement sites turned from scattering points to line extensions along the main-stream of Tanshui River and by the tributaries: the Keelung River, the Hsintien River and the Tahan River. During the late years of Chien-Lung in Ching Dynasty,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irrigation systems, the location of settlement expanded beyond the control of nature factors step by step. At that time, in addition to prolong their land forward to the upstream of rivers and the surrounding hills, the Han Chinese developed the settlement pattern from lines to network even geometry of plane. By the end of Ching Dynasty, the development of settlement in Taipei Basin was very fast and clustered together. Moreover, Taipei also became the third-largest city in Taiwan.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occupancy, streets, blocks and buildings increased rapidly because of the urban development plan, and the Taipei Metropolitan grew into the biggest city in the end.

By examining settlement names and their locations, the process of settlement development in Taipei Basin were discovered. In the early time, the Han Chinese often built their settlements near the sites of

* 本研究之完成承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經費之補助(NSC90-2415-H-133-001)，而研究期間本校社教系林光仁同學協助資料的收集與彙整，在此一併致謝。

*1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社教系副教授

*2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社教系教授

*3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碩士

aborigines or on the terraces, river confluences, sandbars, alluvial plains as well as high banks of rivers. Moreover, the vicissitude of many settlements relied on their surrounding landform transitions, like river channels change or flood events. Therefore, the procedures of settlement development indicated their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landform environment.

Keywords: Han Chinese Settlement, Taipei Area

中文摘要

人類聚落之發展與地形有密切的相關，人類通常選取有利之環境居住，如海岸平原、河岸地、河階、台地面或山間盆地等沃土區，因此聚落的選擇代表著人對維生系統的依存，也詮釋對所處環境的文化反應。

依據文獻的考據，十七世紀初，已有漢人與西班牙人開始於淡水、基隆和北海岸等一帶活動，當時漢人聚落多屬零星發展；隨後漢人聚落的拓展也循先住民的模式，從北部沿海循淡水河口移入台北盆地。在河湖氾濫的環境限制與平埔族的對峙干擾下，匍匐前進，從盆地西部漸次向東，並向周遭盆緣擴張；聚落亦由點狀分布，漸沿淡水河幹流及基隆河、新店溪和大漢溪等三大支流成線狀的發展。到了乾隆晚期，因為灌溉水圳的修築完成，聚落逐漸擺脫自然環境的控制，一方面除了繼續往上游與周緣山地開墾外，另一方面在盆地平原上則由線的交織連結而成帶狀的面發展，街廓不斷拓展，機能也漸趨多元。光緒末年盆地內聚落的開發快速而密集，使台北躍居為全台第三大城；日治時期更在有規劃的建設下，市街範圍不斷拓展，並成為全台最繁榮的大都市。

檢視本區聚落發展歷程，從地名與其位置可以觀察出，初墾的聚落分布，如不是以原有平埔聚落的舊社為有利的根基，就是以河階、沙洲與河埔高地、河流的匯合處或曲流凸岸為選址位置。聚落不僅沿河岸地往周圍丘陵前進，許多聚落的變遷也多與河道變遷或河湖氾濫有密切相關，此種現象說明了本區在漢人的墾拓初期，聚落之型態、分布和演育與周遭地形有著密切的關係。

關鍵詞：漢人聚落、台北地區

一、前言

人類的活動廣泛地受到環境的影響，因此人類活動所衍生的生活模式和文明基礎常與自然環境產生關聯與互動(胡振洲，1977；Haggett，1983；施添福，1987；Fellman，1990)。聚落是人類活動最具體的表徵，也是人地關係在地表型態上最鮮明的呈現；人類通常選取有利之環境居住，如地勢平坦且可免水患之高地、取水便利之河岸或盆地邊緣、土地肥沃和資源充沛之地或是利於防守的地勢等，此種現象說明了聚落之分布與周遭地形有密切關係。地理學者曾探討台灣漢人城鎮聚落的發展，並依其位置概分為港口城鎮(port town)、內陸城鎮(inland town)、山腳城鎮(foothill town)等三種(富田芳郎，1955；陳正祥，1959；石再添、蔡文彩等，1987)，其區位和機能各有特色，顯示出聚落的發展不僅受地形的限制也常隨地形與資源之演育而產生變異。

台北地區範圍包括大屯火山群、林口台地、中央山地北緣的丘陵及其所包圍的盆地。在地質史上，東北側的大屯火山群，係從海中間歇性噴發上升而成，現有二十九個高出1000公尺的山峰，其中以海拔1120公尺的七星山為最高；而台北盆地則為一構造盆地，原與西緣的林口台地相接，後來由於斷層陷落形

成。大約一萬年前的後冰期，海面上升，海水注入盆地而成古台北湖，隨後因陸地隆昇與河流沖積，湖水從關渡溢流而盆底露現。現今盆底平地面積約為243平方公里，外型略成三角形，可以樹林、南港、北投三處作為頂點，範圍大致與二十公尺等高線一致，淡水河及其支流---大漢溪、新店溪、基隆河穿流其中(林朝棨，1959；石再添、鄧國雄，1981)。根據考古史料，台北地區早有人類族群在此活動與居留，從史前時代先住民在山巔水澗間的漁獵游耕，踵繼到西洋列強襲佔的築城建港、明清時期漢人的渡海拓墾、日治時期的計劃經營到光復後的蓬勃發展，欲尋繹這些當時人們生活世界和社會環境網絡的演替，棲息聚落的調查是關鍵所在，因為聚落被視為一種涵蓋視覺空間與使用空間的結構，是人在土地上烙印最深、最廣的「足跡」，故其演化與變遷代表著人對維生系統的依存，也詮釋對所處環境的文化反應(Hart，1982；Gilber，1988)。所以我們可以從台北地區不同時期的文化遺址和遺物、居住聚落的選址和分布型態以及族群遷移和拓墾歷程等，配合相關的地形地物佐證，來解讀台北地理環境的諸項特性和人文活動的更迭情形。

循此，本研究乃以居住環境的角度出發，除了探討地表環境的特性和變遷對於聚落發展的影響外，也進而分析人類聚居環境發展演變的趨勢。本區有人類活動的遺跡甚早，在漢人大規模的入墾前，多屬於原住民生活的空間範疇，有關其史前文化遷徙與平埔族聚落發展等的研究已另撰文說明(吳健蘭、張政亮、鄧國雄，2002)。因此本文的焦點乃在於探討：一、早期漢人在台北盆地及其周遭的拓墾歷程和聚落發展有何特色？二、地形因素對於台北盆地拓墾模式和聚落選址的影響為何？。

二、相關文獻的回顧

聚落(settlement)指人類在一個適當的地理環境內居住而形成的一種地表景觀。聚落的選址、發展與興衰，受地理環境制約的影響很大，故早期定居型的聚落常有「環境選擇」的傾向，例如：(1)鄰近水源，便於生活取水與農業的生產活動；(2)位於河流交匯處，交通較為便利；(3)處於河流階地上，不僅有肥沃的土壤耕作，而且能避免受洪水侵襲；(4)食物與建材取得容易的資源充沛之地；(5)利於防守的地勢或位置等；這充分說明初期聚落的開發模式和發展程度深受自然因素影響(綿貫勇彥，1933；De Blij，1996；Rubenstein，1996)。劉濱誼(1996)針對大陸、埃及和新加坡等一些聚落進行拓撲形態要素的調查和分析中提及，聚落發展的趨勢是先由依賴自然資源，深受環境的控制，然後漸過渡到有組織、有選擇地利用多樣的自然資源，故隨著資源利用能力的增強，人類聚落的選址才逐步從自然條件的束縛中掙脫出來，從海濱、平原、谷地等擴延至所有可聚居的區域。Silbernagel、Martin及Gale等人(1997)曾調查美國密西根沿湖地區聚落的發展模式，發現史前時期、印地安人時期和後來歐洲移民的拓墾路徑和聚落分布，竟有相當高的重疊性，三個時期聚落的地形區選擇，多集中在沿大湖區低地、外洗平原泥岩區和順東南向的底岩緩坡地開發；顯示人類聚落的選擇存在著共同性，取水便利、土地富饒和向陽的平緩地勢是形成居所的重要考量因素。此外，Maruszczak (1997)在波蘭維斯杜拉(Vistula)河谷地區所進行的聚落變遷研究也指出，從史前以來，該地居民即沿著河谷曲流的階地發展出聚落景觀，而後因氣候變遷所導致水量與河道改變，直接衝擊到各時期聚落分布的消長。例如濕潤期，水位高漲，聚落便集中移往高位的河階地；枯水期，河道成瓣狀細流，聚落便陸續散移至取水容易的河灘低地發展，這種「逐水而居」的生活型態是相應著周遭環境的變化。李水城(2002)綜合各項資料，以渭河上游和西拉沐淪河流域各時期的遺址分布為例，來分析中國北方聚落的形成、聚落的形態。同樣地，該研究也歸納出：渭河上游和西拉沐淪河流域因位處丘陵

地帶，緯度較高，對環境及氣候變化高度敏感，當降水較少，河谷深，地形陡峻，聚落多建在低階地上，一旦氣溫升高，降水增加，河道淤積加快，水位高昇，聚落隨之上移至高位階地、山腰處甚至山頂。文中並進一步推測認為此兩區因受外界環境干擾較大，聚落更迭頻繁，不易發展出高度文明；相對地，華北平原的地貌環境變化較小，聚落位置穩定，導致文化輻集與人口聚集，故能發展出高水準的農業文明。

國內對於聚落調查與研究的相關文獻頗豐，惟多偏於民族人類學、人文區域地理及建築地景等領域，對於環境與聚落的互動探討，著墨不多或僅止於環境背景介紹而乏深入分析。洪敏麟(1969)與施振民(1973)曾提及早期的漢人聚落分布大約是依生態環境的自然排列，其位置大體上與原有番社相近，隨後沿著幾個大水圳系統的灌溉埤圳伸展。石再添、鄧國雄等人(1977)在分析濁大流域的聚落分布與地形之相關研究中曾指出，早期該地原住民的聚落分布與地形條件息息相關，聚落選址多在河階、沖積扇、台地面、河口匯流、湖岸與山肩等地，此地點既接近經濟活動空間又有其防禦機能；隨後漢人海陸並進的開墾亦多循海岸平原、盆地、河谷平原與台地地區依次往山麓內地挺進，故居住密集的塊聚落以盆地與海岸平原分布最多，而人口密度低的點聚落則在台地和丘陵區最常見。吳育臻(1988)探討新竹北埔地區的聚落變遷也說明，北埔地區位於環山小盆地上，背山面水的緩坡與沖積平原，不僅利於防守，也適合梯田和農墾，生活可以自足，於是優先成為早期移民力奪之地。施添福(1994)在蘭陽平原的傳統聚落的探討中認為：蘭陽平原的聚落可分為沿山麓沖積扇頂上的隘墾城仔和位於湧泉帶以下的農墾城仔，隘墾城仔源自防守原住民而採集居的方式，後因受地形限制，周圍的土地不易開闢成水田，故聚落仍維持集村型態；而農墾城仔則因四周地形平坦，水源豐富，又易於開築水圳，故解體而發展成散居村落。由此可知，人們對聚落選址因素的考慮很是重視的，居住與周遭地勢環境的互動和演變，不僅影響人口規模、生產方式及社會組織結構，也關係著日後聚落的消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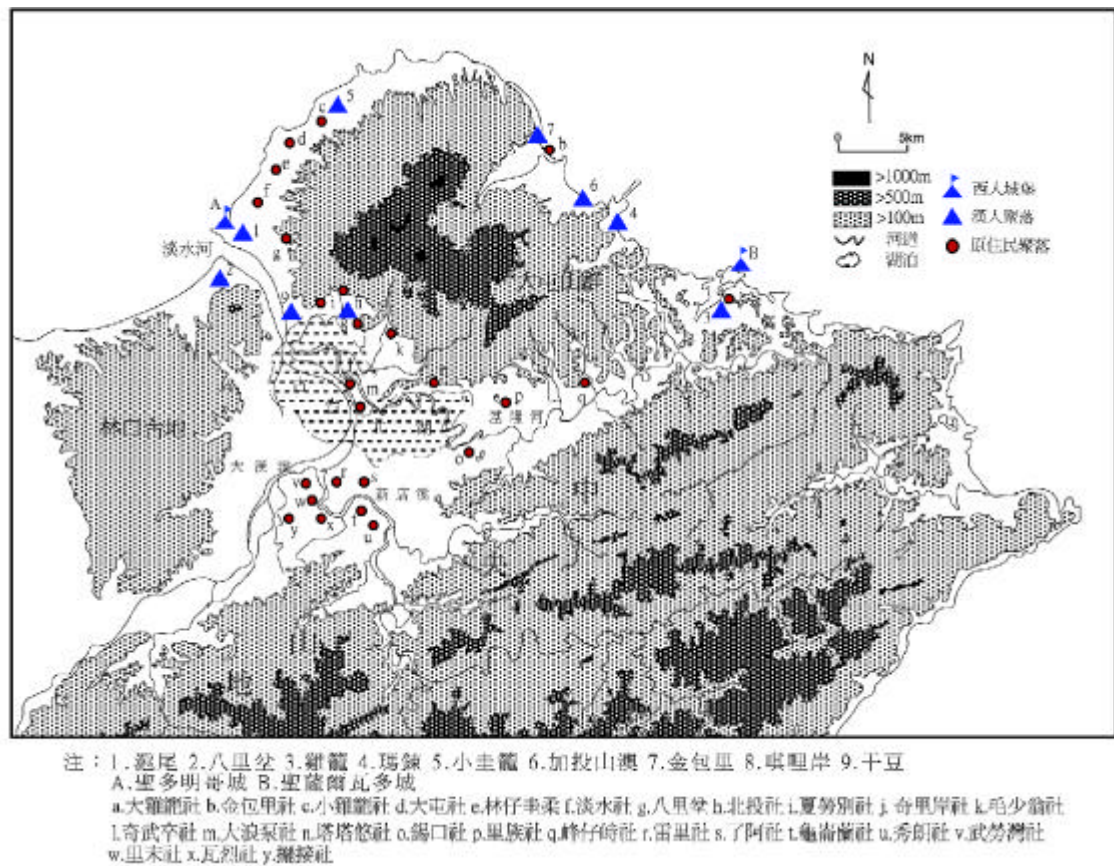
臺北地區在明清時期，漢人陸續進入開墾後，聚落的開發快速而密集，清乾隆年間台北仍只是一個小市街，光緒年代已躍居全台第三大城，日治時期更在有規劃的建設下成為全台最繁榮的大都市。而關於影響這些聚落的拓展和區位轉變的研究文獻也十分豐碩，例如王國璠(1981)、陳朝興(1984)、翁佳音(1984)、廖春生(1988)、黃世孟(1989)、尹章義(1989)、莊永明(1991)均指出台北地區聚落的轉化與自然環境的改變具有密切的關係。王秋原(1968)指出聚落之發生決定於地點(site)，而其發展則決定於區位(location)，以新店溪沿岸為例，聚落之形成頗受地形之影響，如烏來、龜山位於溪流會合處，廣興、灣潭、區尺位於曲流凸岸，而新店則因位區谷口處而發展起來的。李文良(1999)認為早期的聚落發展主要和水運密切相關，因此台北盆地的河川、周圍的海岸狀況對於聚落分布會有重要影響，例如溪谷的自然條件(如坡度)會直接或間接影響聚落的開展。溫振華等(1981)則從方志的記載推論：淡北的拓墾是先以臺北盆地淡水河系下游為重點，漸漸向外環地區與河流更上游地區開墾。此外，彭明輝(1995)認為新莊開發早於社後庄、新埔庄、江子翠庄(板橋)，係因新莊位曲流外側，有較深的水道，利於船隻航泊。而根據新莊市志(1998)記載，地震所引發的康熙台北湖，使新莊瀕臨的河道變深，加上位逢潮流進入台北湖的中點，港深水闊，又無鹹質海水中的生物危害船身，故造成新莊港取代當時淡水港口的功能。謝英宗(2000)在康熙臺北湖古地理環境之探討中也強調，當時地震所造成的下陷量可能僅在三公尺以內，但因該湖受潮汐影響，其水域面積變化相當大，包含現今基隆河下游及其北側、社子島、淡水河社子島段的河道和關渡平原的一部份，估計其面積約為30平方公里左右，故影響當時聚落的變化甚大。

綜合上述各相關的研究，初步可以探知台北地理環境改變的事實可以反證當時聚落更迭的歷史事跡；換言之，聚落作為一個人群生活的地域主體，其初期的演育模式，明顯會因循著自然環境之變遷而調整，

而後藉由群體生活文明堆疊與資源的有效掌控，漸次定位出其聚落文化的內涵與區域發展的特色。然對此跨歷史人文與地理環境領域的議題(例如社會學門與地質學門的聯繫)，目前尚缺深入之研究，是故本文嘗試透過歷史文獻史料的蒐集與地理地形特徵的整合分析，檢視居住環境對於早期漢人在台北地區聚落開發的影響歷程及其互動機制。

三、台北盆地漢人的拓墾歷程與聚落分布

上節敘及台北地區涵蓋區域包括台北盆地、淡水到福隆的北海岸地區、大屯火山群、林口台地及基隆到三峽一帶的丘陵，行政區域包括台北縣、台北市及基隆市等；然為使研究聚焦，本文探究的重點地區乃以盆地內的聚落變遷為主，兼及的相關地區則一併納入考量。區域內主要的地形影響因子為淡水河和它的三大支流：基隆河、新店溪及大漢溪，此外就是海岸地區一些獨流入海的小溪川。本區海拔高度在一千公尺以內的緩坡地、河階、河埔地與盆底平原區都是適宜人類居住及活動的地區，故自古以來就有人類活動(詹素娟、劉益昌，1999)。至於本區何時開始確有漢人遷徙，進而建立聚落，實難有定論，惟不同於對先住民的探索，欲還原這些昔日拓墾的軌跡與聚落的分布，除了遺址遺物的推敲外，古籍文獻與輿圖亦提供許多有用的判斷線索。例如明萬曆十七年(1589)福建巡撫周宗云：「東西二洋共八十八隻，又有小番，名雞籠、淡水，地鄰北港捕魚之處，產無奇貨，水程最近，與廣東、福建、寧州、浙江、北港船引一例，」；而顧炎武於天下郡國利病書中亦提及「凡販東西二洋，雞籠、淡水諸蕃及廣東、高雷州、北港等處商漁船引，俱海防官所為管給。」(程大學，1991)。顯見十六世紀晚期，已有漢人來往於雞籠、淡水等台北盆地外緣的北海岸一帶，當時漢人可能是從事以小額經貿為主的活動，建立的據點應多為零星分布並屬暫住性或季節性移民。十七世紀初，漢人、西班牙人與荷蘭人陸續移入發展，較恆久性的聚落便逐漸成型，史載明末漢人已於雞籠建置聚落，並迫使先住民遷至田寮港與社寮島一帶，西元1626西班牙人自三貂角(Santiago)入據基隆社寮島，建聖薩爾瓦多城(San Salvador)，當時萬里附近亦有漢人聚落稱為Parian(原住民則稱此漢人居住的聚落為「瑪鍊」(Vasai)，1629年西班牙人於滬尾(淡水)建立教堂與聖多明哥城(San Domingo)時，滬尾和對岸的八里坌(八里)早有漢人定居，甚至在淡水河下游出盆口附近的唼哩岸和干豆(關渡)等地都已有漢人聚落的蹤跡。1632年西班牙人闢建淡水至雞籠的陸路，以便於運輸產物，自此從雞籠至淡水的北海岸沿海一帶已發展出漢人和西人聚落穿插於原住民部社之間的景觀，例如當時的漢人聚落小圭籠庄(三芝)便是一個重要的中繼站，而金包里社附近也有漢人開墾的足跡，加投山澳(萬里國姓埔)亦傳在明鄭時期已開闢(洪敏麟，1980；安倍明義，1987)，這由後來荷蘭人所繪的北台灣古地圖中亦可得部分佐證；分析這些登陸初墾的聚落地點，天然的灣澳港口與河川出海口是重要的選址考量，惟此時這些集居的房舍都屬於零散的小型聚落而未見任何大型街庄的發展(圖一)。



圖一 明末時期台北地區聚落分布圖

至於明末清初以前為何漢人聚落僅分布於盆地山區外圍的沿海而無法進入盆地內地，可能的原因有：一、不論是漢人自行渡海來台或是洋人為島上資源而招募閩粵人移民移墾，依據人口移墾模式或遷徙理論都是認為移入型聚落的發展都先於沿海的港灣或河海交會的平坦地建立橋頭堡，集居而形成早期聚落，這種聚集規模乃屬於孤立零散的聚落類型，人口數不多且充滿變動性。二、當時無法迅速進入盆地內地開墾除了台北古湖的積水未退盡、地勢低濕的自然地形因素限制外¹，來自早一步進入盆地定居的原住民阻撓和威脅等不確定因素，也是漢人遲遲未入墾的原因之一。

盆地的地形封閉，因此開墾的路線，從臺北盆地四周之河谷地形和文獻上的記載研判，台北盆地的漢人入墾之通道不外乎下列幾個方向：一、是從南崁一帶及大漢溪河谷北上進入盆地，二、是以淡水河系下游為重點，由河口上溯至關渡入盆地，再沿河道兩岸及其支流拓墾，漸次深入開展。三、是由雞籠登岸，翻越八堵及瑞芳間的山谷循基隆河谷入台北盆地。

從歷史開發的角度來看，台灣開發的順序是由南往北，因此由南崁與大漢溪河谷地區往北入台北盆地是有其理論的可能性，南崁在早期是泛指桃園沖積台地北部(今龜山、蘆竹和八德一帶)之總稱，明末清初

¹ 據地球物理的電測分析得知，距今約一萬年前所形成最早的古台北湖中心位置應在三重、蘆洲及松山一帶(林明聖，1998)，故遲至明末這些局部地區的積水依然未退；裨海紀遊便云：「由淡水港入，前望兩山夾峙處，曰甘答門(關渡)，水道甚隘，入門，水忽廣，漶為大湖，渺無涯涘；行十許里，有茅廬凡二十間，背山面湖，在茂草中...」(郁永河，1983，p.62)

時已有零星的點狀開發²。但從地理環境來看，本區丘陵台地上的溪流縱橫，切割甚劇，加上北有更高的林口台地和觀音山障遮，而東緣大漢溪河谷以東更已進入山地的範疇，這對於聚落的拓墾無疑是種地形的險阻，況且當時本區原住民的聚落頗眾，如坑仔社、南崁社、龜崙社等諸勢力均十分壯大，故漢人要從南崁一帶進入盆地開墾是有其困難的。諸羅縣外記便曰：「竹塹過鳳山崎，一望平蕪，捷足者窮日之力乃至南崁，時有野番出沒，沿路行者亦鮮，孤客必倩熟番持弓矢為護而後行，野水縱橫，或厲或揭，俗所云九十九溪也。遇陰雨天地昏慘，四顧淒絕，然諸山秀拔」。故連昔日郁永河欲入台北盆地探查時，從竹塹北上至南崁附近後，便轉向西北，乘船沿海岸線折至淡水八里坌再進入盆地³。此種情況直至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由海山出霄裡通鳳山崎的大路開通後，漢人北上繞往海路的交通模式才獲得改善，可直接由桃園和大嵙崁溪進入台北盆地(程大學，1991)。

另外，由淡水河口上溯或循基隆河谷入台北盆地，基本上是循平埔族先住民－凱達格蘭族的兩種移入假說模式⁴。惟若以後者的基隆河谷進入考量，則有別於平埔族狩獵游耕的生活方式，翻山越嶺的不斷遷徙實也不符合漢民族農耕的定居型態，況且基隆河河谷中上游的瑞芳和南港一帶，均未見早期任何漢人聚落遺址或史料文獻，因此相信由淡水河口進入盆地開發的可能性是最高。

明崇禎5年(1632年)，史載西班牙人率先由淡水河口進入盆地內的大龍峒一帶探勘並對當地進行撫番的工作；未久荷蘭人在佔領台灣南部後，勢力便漸擴及至台灣北部，並將西班牙人逐出；1644年荷將彼得·彭恩(Pieter Boon)擔任遠征隊指揮官，往雞籠討伐東北部未歸順各部社，並開通淡水到大員的道路，彭恩曾將這一帶的道路、村落及山川繪成地圖，故從1654年荷人西門·吉爾得所繪之「手繪淡水及其附近村落與基隆嶼圖」中，可知淡水河口、北海岸與和平島散布著原住民漢人交雜的村落、耕地以及荷蘭人的碉堡和港口建設等(翁佳音，1998)，而盆地內陸的基隆河、新店溪等流域仍盡屬原住民聚落的分布區。

清康熙22年(1683年)施琅降台，台灣收入清朝版圖，兩岸來往禁忌消泯，交通漸趨密集，這也意味康熙年間台北盆地的開發進入筆路藍縷的早創期；由於拓墾需眾人之力，不論結民耕墾或合組墾號，均會衍生出的集居型態與互助組織，這即是聚落發展的基礎，故藉由拓墾的歷程可以成為窺視漢人初期聚落分布的重要指標。據康熙年間本區拓墾的文獻彙整可以看出(表一與圖二)，當時聚落的發展有幾項特徵：一、此時除了盆地外圍(如三峽、鶯歌、土城、樹林、淡水)的持續開墾外，漢人入盆地仍屬嘗試性質，故墾地與聚落多分布在盆地內西緣的河岸一帶，且成零散的點狀分布。二、拓墾由關渡和五股往基隆河下游的石牌、士林、大漢溪的新莊、板橋及中永和等地成跳躍式推入，這種開展方向與時序，證明漢人應是淡水河口進入，聚落也是由西向東發展。三、除沿河要津外，多數農耕聚落均是近水而非臨水，說明當時河川未整、渠圳未闢時，河岸氾濫原隨時有被洪患威脅的可能，故農墾聚落雖為取水灌溉而選近河的平坦地發展，卻不會緊鄰大河岸邊，以避免洪害。四、當時漢人未深入盆底，不但開發遲緩且不順遂，除了畏懼原住民的騷擾外，盆地沼澤地形的隔阻實是一大主因，尤其康熙三十三年地震引發大規模陸沈，形成所謂康熙台北湖，對於拓墾和聚落的移入影響甚大，當時其水域含括現今基隆河下游及其北側、淡水河社子島段的河道和關渡平原的一部份，相當於今海拔五公尺以下的盆底，估計其面積可達30平方公里；又因該湖受感潮

² 桃園縣志載：相傳明永曆三十五年，鄭成功率軍由台南搭船至桃園沿海與南崁一帶屯墾。

³ 裨海紀遊：「四月二十七日，自南崁越小嶺，船在海岸間行，巨浪捲雪拍轅下，衣袂為濕。至八里坌社有江水為阻，即淡水也。深山溪澗，皆由此出」(郁永河，1983，p.60)

⁴ 關於凱達格蘭族的起源和遷徙，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是伊能嘉矩根據祖源傳說認為族群登陸地在福隆一帶，然後沿基隆河谷進入盆地；另一是李壬癸和劉益昌根據語言及史前遺址分布，認為登陸地在淡水河口一帶，再上溯至盆地發展(轉引自吳建蘭等，2002)。

表一 漢人早期拓墾台北地區的歷程簡表

年代	開發地區與聚落名稱
明末時期	滬尾、八里坌、雞籠、瑪鍊(萬里)、小圭籠(三芝)、加投山澳(萬里國姓埔)、金包里(金山)、噶哩岸與干豆(關渡)等
康熙年間	五股興珍、洲後(初年)、樹林局部地區(23年)、三鶯南靖厝、關渡、石牌一帶(24年)、新莊局部(34年)、中永和的秀朗(47年)、社子、士林、大稻埕和八里等地(48年)、北投、松山下塔悠(中期)、鶯歌土城、新莊, 石牌和桃園蘆竹(52年)、新莊局部(54年)、士林、淡水與新莊等局部地區(59年)、板橋新埔(60年)、
雍正年間	艋舺、景美局部(初年)、新莊(元年)、社子(3年)、八芝蘭街(5年)、文山、新店(7年)、南港、新莊頭前庄、中港厝庄(9年)、蘆洲水滴庄(10年)、新莊、龜山局部(11年)
乾隆年間	三峽、土城清水坑、士林芝山岩(初年)、松山興雅地區(元年)、新埔(2年)、八里坌、滬尾、大屯、竿蓁林、關渡、北投、八芝連林、奇里岸、瓦笠、大灣、大佳臘、圭母子、大灣、興直、加里珍、擺接、山腳、八里坌仔、海山等街庄成形(7年)、大浪泵莊、塔塔悠庄、貓頭錫口庄、里族庄(12年)、永和龜崙蘭溪洲(13年)、深坑(20年)、萬盛、興福、大坪林三庄墾成(22年)、水返腳、汐止峰仔峙、七堵、八堵(23年)、永和南勢角埤塘尾(24年)、六張犁內埔仔庄(26年)、大南灣、小南灣、長道坑、三角埔、石頭溪、海山、彭厝、中庄仔、中港厝、塢仔、山腳仔、永興、擺接、新埔、火燒、加里珍、頭重埔、大牛欄、八里坌、庄埤頭、石灰窯、柑林、廣福、員林仔、清水坑、牛埔、南勢、二十八張犁、芎蕉腳、秀朗、武勞灣、漳和、永和、大坪林、周崙厝、萬勝、古亭、艋舺渡街、奇武卒、大浪泵、中崙、下埤頭、大加臘、上鉅頭、興福、內埔仔、新莊、塔塔悠、貓裏錫口、里族、內湖、南港仔、和尚洲、峰仔峙、八芝蘭庄、石角、北投、瓦笠、干荳、奇里岸、滬尾庄、竿蓁林等街庄生成(29年)、木柵墾成(30年)、中和永豐庄(32年)、大直(33年)、烏塗堀、田心仔(中期)、南港新庄仔(41年)、木柵十五分山(42年)、木柵灰磘坑(44年)、深坑子庄(46年)、大溪街(53年)、安坑外五張石頭厝(55年)、土庫尖(57年)

資料來源：見淡水廳志等參考文獻彙整

註解：1. 一般而言，開墾後移民容易集結於附近定居，是聚落形成的重要指標。

2. 資料可能有所疏漏，且局部資料依不同文獻之記載，開墾與聚落正確形成的時間常有差異，如龜崙蘭溪洲庄一說是乾隆13年，另一說則為52年。另有些地區雖初墾較早，但大規模開發仍有一段時差，如秀朗地區在康熙時陳賴章等人已經入墾，但至乾隆中期才取代平埔族社落，發展為具規模的漢人聚落。

3. 乾隆7年的聚落資料取自劉良璧的重修台灣府志，乾隆29年的聚落資料取自余文儀的續修台灣府志，因直接引用，故地名有重複出現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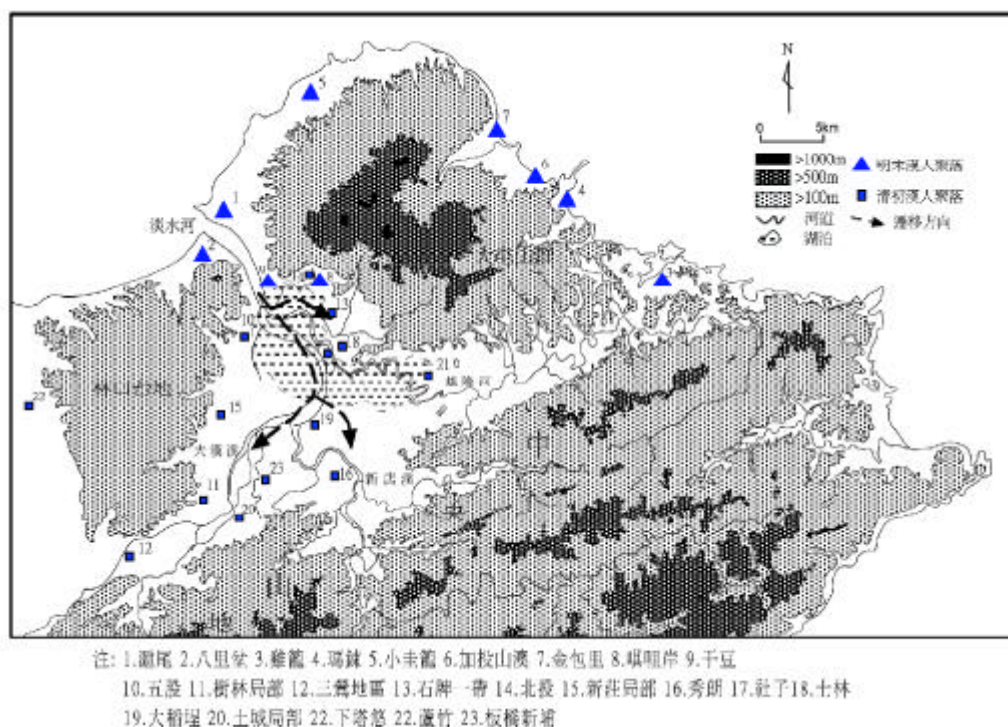
現象影響，不僅湖水有鹹化現象，水域面積變化也相當大(謝英宗，2000)，故連當時鄰湖的平埔族聚落都紛紛搬遷⁵，當然漢人也退避三舍。

雍正十年(1732年)，清廷允許移民攜眷屬入臺，形成一波移民熱潮。而雍正年間至乾隆初期，盆地的聚落發展，也漸由點的零星分布轉向沿河伸展的線段連結，雖然初墾時的聚落分布，如不是以原有平埔聚落的部社為根基點綴其間(平埔聚落遠多於漢人聚落)，就是以河階、沙洲與河埔高地、河流的匯合處或曲流凸岸為選址位置。然此時開發的特色已非一地單點的跳躍式拓墾，而是一個區域內多點延續的串聯，並逐次沿各支流上溯推展，形成以河系為節點連線的聚落分布型態(圖三)。例如基隆河系的士林(八芝蘭)一帶久經開墾，已發展成市街的聚落規模，而且基隆河系已從社子、石牌、士林越過松山、內湖等湖沼地往上延抵南港，更於乾隆初年拓殖至汐止(水返腳)。大漢溪的新莊歷經楊道弘、胡焯猷、林天成等多人的開發，已有頭前庄、中港厝庄等多處聚落，而且上延至板橋一帶(擺接庄)，與新店流域的開墾幾乎串連在一起；而康熙台北湖的形成，使得臨大漢溪河岸的新莊水道加深，可航泊大船，成為淡水港在進入關渡盆口之後主要物產的輸送內港，故快速發展成為農商人口聚集的大鎮，乾隆初年本地已成繁榮市街。至於新店溪沿岸則由原先的秀朗一地拓展成漳和、永和、永豐三庄，代表中、永和地區的聚落開發已具雛形，同時其上游支流，如景美溪的景美、新店(大坪林)和安坑溪的南勢角、安坑(暗坑)一帶亦都已陸續拓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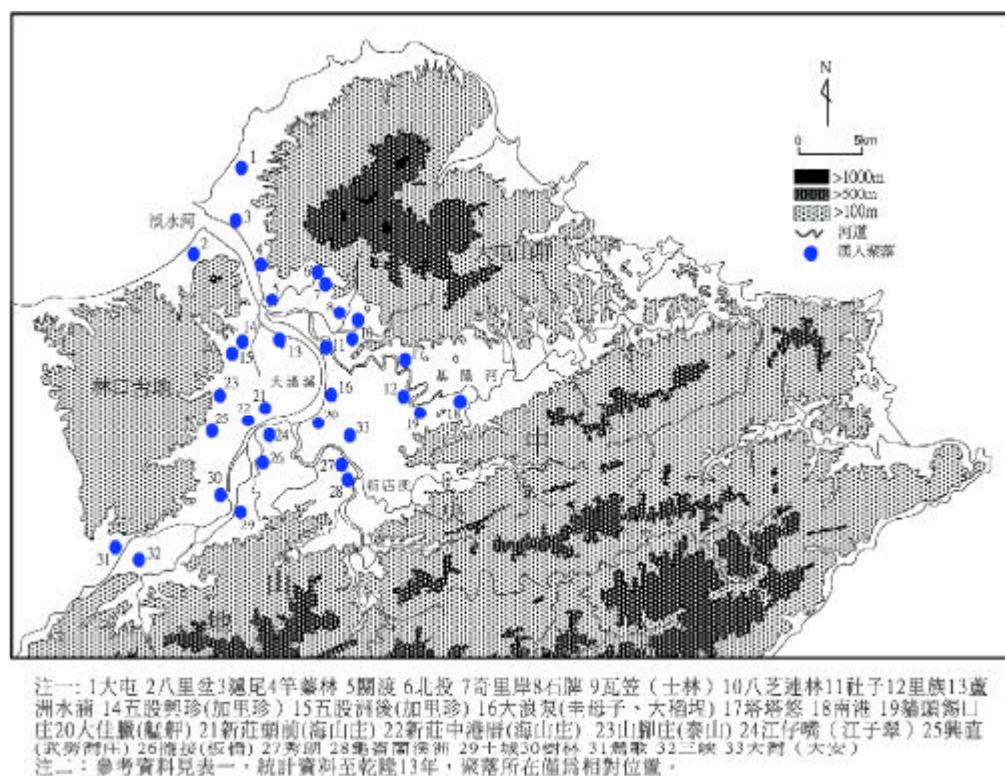
乾隆時期是台北盆地拓墾過程中，邁向高峰期的重要階段，也是聚落發展由線的延展朝向縱橫網格連結的關鍵期，而這裡最重要的轉變因素便是埤圳的興建和灌溉系統的建立。因為移民增多、定居定耕與作物商品化的需要，農業生產的方式必由粗放式燒墾轉為集約式定耕農業，為提昇糧食作物(稻米)產量，墾地水田化來取代旱田的趨勢便無法避免(張炎憲等，1996)，而原有依靠鄰近河川、湖泊灌溉或看天田的耕墾方式，已無法支撐定居型聚落的人口贍養，因此欲擴大耕地必尋找固定且充足的水源灌溉及系統排水的順暢，故在先民的開發史上，通常把水利開發看做土地開墾的一部份，當穩定的灌溉系統建立以後，開墾工作才能算大功告成。早在康熙末年至雍正時期，墾民除了引河水外，也利用天然池沼，築陂造埤，儲蓄雨水，以灌溉田園，而後等耕地擴展、聚落生成後，更糾結眾人之力闢水渠引河湖澆灌墾地，漸化荒蕪為阡陌良田。據載在開發較早的北投地區，局部地勢較高的近山區或離河川水源地較遠的墾地已利用山凹地築陂塘或自行闢建水渠引河水進行灌溉，例如鄭維謙與佃戶合築的雙溪圳，舉人王錫祺和農民合築的七星墩圳等(吳建民，1991)，當時糧食除了自給有餘外還能將稻米輸出；而到了乾隆年間隨開墾範圍越大，取水和排水的水利建設，亦逐步興起，

當時在盆地平原上經人工整修的灌溉湖陂主要有上陂頭陂(今大安區一帶)、雙連陂(雙連地區)等，其灌溉面積均超過百甲，而陸續修築完成的主要灌溉水圳計有(表二)：1.霧裡薛圳 - 灌溉文山、公館及萬華一帶；2.永豐圳 - 灌溉中、永和及安坑；3.張厝圳 - 灌溉大漢溪北岸的樹林、新莊及三重；4.大安圳 - 灌溉土城、板橋及中永和；5.福安圳 - 灌溉山佳、三峽、鶯歌；6.萬安圳(永安圳) - 灌溉新莊、三重埔及五股等地；7.瑠公圳 - 灌溉新店、景美等台北地區。著名的瑠公圳原稱金順興圳，乃為郭錫瑠為增加灌溉水量而將其原先建築好的大坪林五莊圳再進行疏鑿的，瑠公圳完成後，曾被洪水沖毀，但後來由郭錫瑠的後人接手並修復完畢。瑠公圳引水自新店溪碧潭，向北跨過景美溪，導入盆地內廣袤的開墾平原灌溉，在極盛時期，共有大小水圳26條，給水線長達140公里，灌溉區域遍及景美、古亭、大安、中山、松山及台北縣新店、大坪林等地區的農田，面積達一千餘甲(陳培桂，1984)；縱橫交錯的水圳網絡，不但代表著台北盆地由原住民漁獵游耕的生活舞台，轉化成漢人農業定耕的田園景觀；也意味著初墾階段的結束與漢人勢力

⁵ 裨海紀遊載：「甲戌四月，地動不休，番人怖恐，相率徙去，俄陷為巨浸，距今不三年耳。」



圖二 明末及清初康熙年間台北地區漢人聚落分布圖



圖三 清乾隆初時台北地區漢人聚落分布圖

表二 台北地區清乾隆以前主要水圳建設一覽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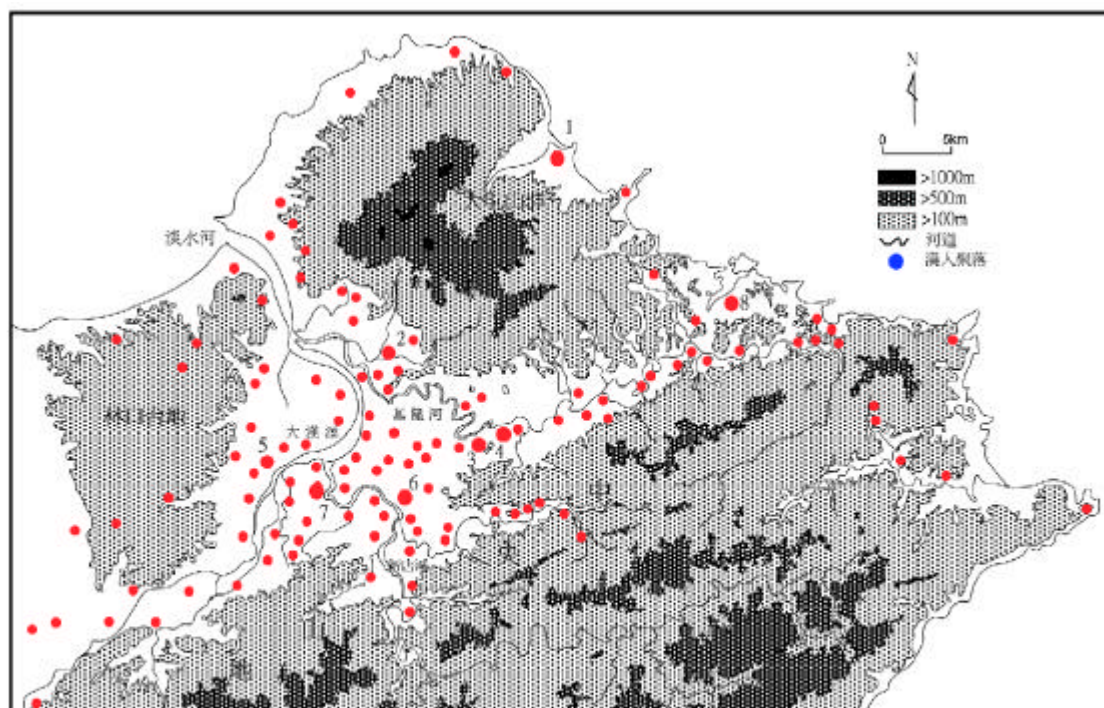
年代、圳名	由來、位置與灌溉範圍
雍正4年 七星墩圳	鄭維謙與佃戶合築的「雙溪圳」，舉人王錫祺和農民合築的「七星墩圳」。此後陸續開築圳路「福德洋圳」、「番仔井圳」、「水箕頭圳」、「水磨坑圳」、「八仙圳」、「唭哩岸圳」、「磺溪內圳」、「磺溪內二圳」等，灌溉北投、淡水等區，因逼近山麓，多為小圳。
雍正二年 (一說雍正末年) 霧裡薛圳	又名內湖陂、周七股圳。淡水廳志所載：圳在拳山堡，距廳一百餘里，莊民所置，其水由內湖溝子口鯉魚山腳築陂(景美溪)，鑿穿石門過景尾街後溪仔口、公館街後，通流灌溉大加蚋溪畔古亭倉、陂仔腳、三板橋、大彎庄、下陂頭及艋舺街後一帶等田七百餘甲，至雙連陂為界。
乾隆初年 永豐圳	為林成祖(林秀俊)等鳩佃所築，自暗坑口引新店青潭大溪(碧潭)之水，灌溉暗坑、南勢角、枋寮一帶，面積約八百餘甲，並取代原先的南勢角大陂。
乾隆五年 瑠公圳	又稱金順興圳，由郭錫瑠賣田產獨資，歷20年完成。他疏鑿原先的大坪林五莊圳，完成了碧潭到台北的灌溉大圳。瑠公圳原有大小水圳26條，給水線長達140公里，灌溉區域廣布景美、古亭、大安、中山、大同、松山及台北縣新店、大坪林等地區的農田，面積達一千二百餘甲。
乾隆10年 永安圳	張必榮提地，張沛世出資1萬8千5百兩所鑿，至乾隆31年完成，後併萬安圳；再與草埤合稱後村圳。
乾隆10年 張厝圳	又稱為永安圳(陂)、沛世圳(陂)，由張必榮、張沛世合資鑿圳，其水源來自二甲九福安陂，並引擺接溪水，因水源不足，又在三塊厝處引水，灌溉大漢溪北岸的部分田園，包括海山莊(樹林)及擺接堡之西盛、白子林(瓊林)，興直堡之新莊、頭前、二重埔、三重埔等田六百餘甲。
乾隆13年 大安圳	相傳為林成祖所鑿，引三叉河二甲九至鴟鵂山下(土城的媽祖田引大漢溪)，經九芎林，引入大陡門，至軟陂下(四汴頭)分為四圳，灌溉土城庄頂埔、員林、柑林埤、清水坑、廣福、新埔、陂仔港、港仔嘴、溪洲、內外員山、埔墘、芎蕉腳、水尾、牛埔、山腳、二十八張，而東側兩道分別灌溉中永和的員山仔庄、外員山庄及永和庄，以及四十張庄及漳和庄。
乾隆中葉 福安圳	又名十二股圳，張必榮、吳際盛等開墾，其水自二甲九分擺接溪源至樹頭陂引入，後改大料坎溪的中坑口導水，灌溉300餘甲，主要在海山莊的山仔腳(山佳)、彭福、陂內坑、潭底、羌仔寮、三角埔等樹林一帶。
乾隆26年 萬安圳	又名劉厝圳，劉永纘鳩佃所築，其水自擺接堡古寧莊下鑿，引擺接溪而下，灌溉新莊中港厝、頭重埔、二重埔、加里珍(五股)等260餘甲。
乾隆41年 水箕頭圳	芝蘭堡謝開德等開鑿水箕頭圳，潘宗勝等開番仔井圳。

資料來源：林克夫(1954)、吳建民(1991)

的確立，這時漢人聚落大量湧現，而平埔族的社址則漸漸從空間與地圖上消失，例如乾隆初期盆地只出現了八里坌、新莊街、艋舺渡頭街以及芝蘭街四個主要的大型市街，及其他的零星的小型開墾聚落。但到乾隆 30 年代就已有近七十個聚落，且呈包圍原住民村落態勢，漢人和原住民勢力的消長可見一斑。

此時板橋與中永和地區沿著大安圳形成許多新聚落，如土城庄頂埔、員林、柑林埤、清水坑、廣福、新埔、陂仔港、港仔嘴、溪洲、內外員山、埔墘、芎蕉腳、水尾、牛埔、山腳、二十八張。清道光以後，從新莊、艋舺批入大量貨物，在銷售市場體系中，逐漸使以板橋為中心的擺接堡內之數十庄成為商業繁忙之區，範圍更擴至中永和的東北區，促進聚落進一步地加速開發。而瑠公圳灌溉區域所及之地，如錫口的五分埔(今松山區)、興雅庄、中陂、上車層、三張犁、豬哥寮(今信義區)、牛埔庄、十二甲、六張犁、公館(今大安區一帶)與梹尾、牛埔、灰窰、四十張、員山子、大坪林(景美、新店)已成村落，此外南港、木柵與新店等盆地周緣的聚落也紛紛興起，這些聚落具兩個主要的特色，一是這些聚落的位置已經擺脫昔時對河系的依賴，而是藉由圳道開鑿，轉向廣袤的平原延伸，使盆地內的聚落由線的連結發展成網格狀的交錯聯繫；二是異於早期依其所在地勢、地理位置的自然條件命名模式(如水返腳、中港、暗坑等)或沿用原住民的聚落名稱(如八里坌、錫口、大隆同、擺接庄等)，這些新興聚落的名稱已明顯地多漸漸使用與農墾活動或人文主題相關的地名稱呼(如五分埔、中陂、上車層、三張犁、牛埔、灰窰、四十張等)。故農墾聚落已成為盆地平原主體，這不僅說明了盆地已進入大規模開發的階段，也代表隨著生產力的提高，故誠如劉濱誼(1996)所言，人類克服自然與利用資源的能力不斷提昇，改變了以往直接掠奪少數原生資源(如漁獵、游耕活動)而發展到有組織、有選擇地利用多樣的自然資源，進而發展為利用次生自然資源(如農業栽培、畜牧養殖)。因此當資源利用與改造的能力增強，聚落選址也隨著從自然環境的條件限制中掙脫出來，從原有的臨河或接近生產資源的平緩區擴展至所有可聚居的區域，甚至利用技術改變自然條件來因應居住與生存的所需！

嘉慶道光年間，盆地內已到處皆為漢人聚落，同治年間更大規模進入周遭山地(圖四)，顯現漢人擴張的迅速，而原有在台北盆地內的原住民則被迫退入附近山區或同化，主客悄然易位。當時聚落發展除了盆地內平原區由網格連成面的發展外，由於盆地之中心地帶多已開發完成，當時移入之漢人便沿三大河流支系上溯至盆緣山區繼續進行拓殖，故發展模式是以盆底中心帶向周圍山地成輻射狀線的延展(見表三整理)。例如在新店溪的開墾方面，乾隆末年已由大坪林五庄試墾至暗坑仔庄附近(新店溪的支流安坑溪一帶)，嘉慶 17 年秀朗社番招墾戶張福星更至新店溪上游青潭內過橋坑開墾，嘉慶 22 年林開成開墾新店溪支流安坑溪的中和石門附近；阿柔庄(隘寮埔、阿柔埔、阿柔庄)、麻竹寮庄、烏月庄(烏月、發達埔、發達庄)相繼開成，嘉慶 23 年韓敬元承墾青潭庄內赤皮坑，道光年間除了青潭庄完成開發外，再往上游及其支流北勢溪開墾，灣潭、蘆竹南庄、粗坑庄、屈尺庄及出林口、鳳山埔庄、頂石厝庄、下石厝庄、中溪洲、塗潭庄、直潭庄乃至於獅仔頭坑(小格頭)等均相繼墾成並形成聚落。此外沿景美溪支流往上的深坑、石碇等地之移民亦多，道光 15 年深坑溪以南的阿柔坑、魚衡仔庄、草地尾庄、大坑庄先後開發完成；道光 18 年坪林一帶亦出現柑腳坑庄、闊瀨庄、楣仔寮庄、大舌湖庄等聚落，道光末年陳光瑞募泉州移民由深坑溪的石碇街越分水嶺進入北勢溪的坪林尾開墾。而基隆河上游部分，乾隆年間除了五堵至八堵間陸續嘗試屯墾外，李大青已至基隆河上游探墾菁桐村，嘉慶初年泉州人黃文富也曾至平溪的薯榔寮，嘉慶 22 年泉州安溪余氏家族成功拓墾了六堵庄，道光 15 年漢人入墾暖暖後，煤礦的發現與開採使基隆河上游的開發也加速起來。至於南北向的大漢溪(大科崁溪)流域方面，由於大漢溪主流的坡度較緩，河谷較為寬闊，又是台灣南北往來的交通孔道，故開發較早；例如相傳在康熙 24 年(1685)泉州人陳瑜已來到大漢溪中游的三峽南靖厝一帶開



注一：主要參考資料來自清同治9年(1870)淡水廳志所載之街市，因聚落數量眾多，故僅標注大型市街聚落提供對位參考，局部聚落因對比困難，位置可能有所誤差。
 注二：1.金包街 2.芝蘭街 3.錫口街 4.南港仔街 5.新莊街 6.公館街 7.枋寮街 8.大雅麗街

圖四 清同治初期台北地區漢人聚落分布圖

墾，乾隆10年柑園、隆恩埔一帶已成聚落，乾隆20年安溪人董日旭墾公館尾、礁溪、八張、中埔等地，平地盡開，嘉慶九年(1805)吳鞍則於鶯歌大湖兔子坑開創窯業，製作陶瓷器，進而發展至坂腳、尖山埔等地；而大溪聚落的開發亦早，乾隆初年閩人謝秀川、賴基郎二人與蕃人締結合約，開拓田心子、月眉一帶之地，而陳合海則於現在大溪的上街建造家屋，隨後江蕃也於下街，增建家屋，塑造出今日大溪街的規模。

歸納言之，這些山區沿河谷地的開墾，不同於盆地平原區的發展模式，乃是除了稻米等糧食作物的生產供給外，經濟作物栽培與自然資源的開採更是這些小型聚落發展的主要因素，不論是早期的大菁和樟腦或是後來茶、瓷土與煤礦等，都深深影響著這些聚落發展的興衰⁶，這些資源的取得與供輸，不但維繫山區漢人聚落的開發模式，也造就出盆地平原聚落機能的轉型和商業發展的契機。咸豐至同治時期，周圍山區持續推進深墾，例如新店溪流域於同治年間已溯至北勢溪上游的番仔寮坑、金瓜寮、九芎根開墾；基隆河到同治9年時已有發展出五堵庄、六堵庄、七堵庄、八堵庄、暖暖庄、石碇內庄、四腳亭庄、柑仔瀨庄、魚寮魚坑庄與近十分寮附近的芋仔潭庄等聚落，並與鄰近廳縣(如雞籠、噶瑪蘭)串聯交流；而盆地內平原除了一些易淹水的低溼地外，基本上已完全開墾完畢，聚落的發展則轉向產業與交通等人文條件掌控，一

⁶ 例如當時的三峽、石碇和暖暖都是大菁染料的集散中心，而大溪、屈尺、烏來、十分寮和新寮等地的開發則是和採樟煮樟關係密切，而後除了煤礦資源外，隨著茶葉經濟效益的提昇，許多山區也紛紛改種茶樹銷售，例如三峽和石碇等地區。同治十年(1871)淡水廳志便云：「淡北石碇、拳山(文山)二堡，居民多以植茶為業；道光年間，直插山園，各商運茶，往福州售賣。」

表三 漢人入墾台北盆地周緣山區略表

位置	開發地區與聚落名稱
新店溪河系	嘉慶 17 年：關旺耽庄(深坑)，墾內過橋坑(青潭)；嘉慶 22 年：石門附近(中和)，阿柔庄、麻竹寮庄、烏月庄(深坑)；嘉慶 23：內赤皮坑、麻竹寮、青潭大溪(青潭以南)；道光元年：深坑、石碇地方移民益多；道光 2 年：墾屈尺、小油車坑(新店)；道光 6 年：楓仔林庄(深坑)建成；道光 6 年：墾坪林尾、魚逮魚窟、九芎林(新店)；道光 9 年：青潭庄、灣潭莊、蘆竹南庄、粗坑庄、屈尺庄、出林口、鳳山埔庄、頂石厝庄、下石厝庄、中溪洲、塗潭庄、直潭庄(新店)；道光 10 年：增加吊橋坑赤皮湖庄、大崎頭、大崎腳庄、大水堀庄、蕃薯寮庄、楣仔坑庄(新店)；道光 11 年：大粗坑(青潭)甲場埔(新店廣興)；道光年間：墾獅仔頭坑(小格頭)；道光 18 年：柑腳坑庄、闊瀨庄、楣仔寮庄、大舌湖庄(坪林)；道光 24 年坪林尾、粗坑、虎尾寮(坪林)；咸豐 10 年：坪林尾庄、水聳坑(坪林)同治年間：墾番仔寮坑、金瓜寮、九芎根(坪林)
基隆河河系	乾隆 41 年：墾新庄仔(南港)；乾隆年間：墾青桐村、白石腳庄(平溪)；乾嘉年間：墾薯榔寮(平溪)；嘉慶 8 年噶嘮別庄(北投忠義山)；道光 15 年：偷墾暖暖庄；道光 21 年：西勢埔(暖暖)；同治 10 年：暖暖庄、石碇內莊、四腳亭莊、柑仔瀨莊、魚架魚坑莊(瑞芳)、芋仔潭庄(十分寮)
大漢溪河系	乾隆初期：柑橋埤、冷水坑、內外藤寮坑、大安寮、媽祖田(土城)；乾隆中期：烏塗堀、田心仔(大溪)；乾隆 20 年：公館尾、礁溪、八張、中埔等地(三峽)；乾隆 53 年：大溪街；嘉慶 7 年：後埔溪(三峽)；嘉慶 9 年：大湖兔子坑(鶯歌)

資料來源：見參考淡水廳志、台北縣志等文獻彙整

註解：資料蒐集至同治時期，山區墾地開發多屬零散且易受干擾而中斷，所以文獻蒐集不易，記載上也常有些出入，如嘉慶 17 年陳金瑞為首的墾戶曾在深坑一帶開關旺耽庄，但因一度受生番襲擾，至道光 2 年聚落才穩定生成；故表列開墾與聚落形成時間僅提供參考。

些獨立零散的點聚落連成緊密面聚落並形成街廓，城樓與商店取代田疇農舍，經貿機能也日益增強，新莊、板橋、艋舺、大稻埕等市街陸續生成，咸豐 10 年(1860)淡水開港通商，貿易帶動政治與文化活動的蓬勃，盆地內的聚落發展模式已呈面聚落的拓模延展，核心 - 邊陲的區域發展模式漸漸成形，都會結構日趨完善；光緒 8 年(1882)臺北建城，光緒 20 年台灣巡撫邵友濂將省會移至臺北城，清末至日據初期進而將此第三大城的台北推昇為全台的首善之都。

當開發底定，墾民陸續移入定居，聚落便逐漸建立，有些聚落進而演化為村落或市街，並成為行政區劃的基層管理單位。表四整理清領時期各方志中有關大台北地區主要街庄記載的歸類，從這些已具規模街庄的地名和數量觀察，也可以進一步對應與歸結本區開發歷程與聚落分布的特徵：一、從乾隆初期重修台灣府志的記載，本區已墾成並發展出的行政聚落僅有十九處，可代表康熙與雍正時期本區的開發仍處於初期緩慢階段，這些早期漢人初墾聚落的分布十分零散，且常依鄰平埔族部落來發展，名稱亦多沿用原住民的社名，說明在自然環境的限制下，聚落選址是趨向已開發的便利性與地形位置的優越性為考量根據。二、乾隆時期人口大規模的移入和水利設施的興建，是本區開發與聚落成長的關鍵因素，短短二十餘年間，漢

表四 清領時期各方志所載台北地區漢人街庄聚落的數量與地名歸類統計

漢人移墾時街庄聚落命名依據		沿用原住民社名		自然環境與位置		人文墾殖活動	
時期與資料	總數	個數	%	個數	%	個數	%
乾隆 7 年(1742)重修台灣府志	19	15	79%	3	16%	1	5%
乾隆 29 年(1764)續修台灣府志	63	17	28%	23	36%	23	36%
同治 9 年(1870)淡水廳志	112	25	22%	41	37%	46	41%
光緒 13 年(1887)淡水縣志	252	20	8%	111	44%	121	48%

註解：各方志中所列的台北地區漢人街庄數與歸類別可能與實際略有差異，例如乾隆 7 年重修台灣府志的淡水廳共有二保，其中位屬大台北地區的淡水保共有二十五庄，但有些街庄屬於現今桃園縣，如虎茅、奶笏、潤仔歷、甘棠等庄，有些庄址則位置不明，如永(水)興庄等，因此計算總數上稍有出入；此外有些地名在歸類上有困難，如龜崙蘭溪洲庄兼具原住民社名與自然位置的雙重特性，故在類別統計上也有些因取捨的誤差。

人聚落大量浮現，主要街莊聚落增加高達三倍以上，此時聚落名稱的特色已擺脫沿襲原住民的社名稱呼，漢人不僅沿淡水河三大支流自行尋覓優良的地理形勢作為安身立命之地，在盆地平原上也逐漸使用與農墾活動或人文主題相關的聚落名稱，故從以自然環境和人文墾殖活動的地名急遽增加觀之，漢人在本區拓墾優勢已經確立，並取代原住民原有的主體地位。三、從乾隆到同治初年的百餘年間，隨著漢人的技術提昇和對資源的有效運用，耕地不斷拓展，聚落也漸掙脫自然環境的束縛，穩定地達到倍數的成長，此時大量與人文活動有關的聚落名稱已超越對自然環境和原住民名稱的命名方式，顯示漢人此時聚落發展的重點不僅只是盆地內與周緣山區的開拓，而是大型街庄的建立與各聚落網絡間的縱橫連結，這是聚落發展整合過程中重要的轉型過程，也代表聚落從單純的各別自給農村，局部整併成為商業城鎮的徵兆；咸豐十年淡水的開港通商，更刺激以台北盆地為中心的北台灣對外經貿的進一步拓展。四、挾天時與地利之便，移民潮一波波湧入，不到二十年間，本區在清末的光緒年間，聚落數目又增加一倍以上，總計二百五十多個大小聚落星羅棋布地鋪陳在盆地與周遭的土地上，盆地已進入完全開發的成熟階段；聚集經濟的利益促使相鄰聚落併聯成鱗次櫛比的街廓，聚落機能也加速地分化，許多地理位置優良的聚落瞬間脫胎換骨成繁華的商業市鎮，也進而奠定了日後本區在島上政經地位的穩固磐石。

四、漢人聚落拓墾與地形之關係

當人類捨棄游牧，嘗試在固定地點進行糧食生產與放牧活動時，選擇適當的位置進而建立較長久性的集居住所是首要之務，這也是聚落形成與發展的雛型。此時人們所選擇聚落不但會明顯考慮穩定與有利的自然條件定居，也會賦予此一特定空間位置的一個專有的名稱以利記憶，這便是地名的由來。隨著人類技術的發展和活動領域的擴大，聚落逐漸演化成村落，有些會再發展為城鎮，而地名也常因此更迭或轉化。而漢人在入墾之初，面對一片荒煙蔓草的未知地區，對地名識別的最便捷方法是襲用當地原住民的稱呼(溫振華，1981)，這也解釋了為何漢人初墾時期聚落的名稱幾乎都是使用當地平埔族的稱呼或社名轉譯而來的緣由。除此之外，當先人進入陌生之地，本能地也會先對自然環境加以觀察，此時又以對地形的辨識最為重要，因為地形特徵通常規模較大、型態明顯且保持較久，故直覺上容易以地形特徵作為最初地名的

命名，以利記憶。所以前列表四中許多以自然環境做為聚落名稱中，依所在地形特徵或位置作為命名的占大多數。即便是許多被歸類為漢人沿用平埔族社名的聚落名稱，許多也都是以平埔族依其所在地的地形特徵，用他們的語言命名傳遞下來的，例如漢人噶里岸庄乃原先平埔族噶里岸社址的所在，而噶里岸乃當地平埔族對海灣的稱呼，因為當時該地仍在淡水河下游的古台北湖邊，地勢彎曲如海灣，故取噶里岸為其社名；又如大佳臘(加叻)庄亦源自平埔族的大佳臘社址，當地平埔族語的原意是一片大沼澤的低濕地區。由上述概念的延伸，本節即藉由一些地名的回溯還原(參見表五)與所在地勢的歸納分析，探究地形特徵對於漢人在台北盆地拓墾和聚落選址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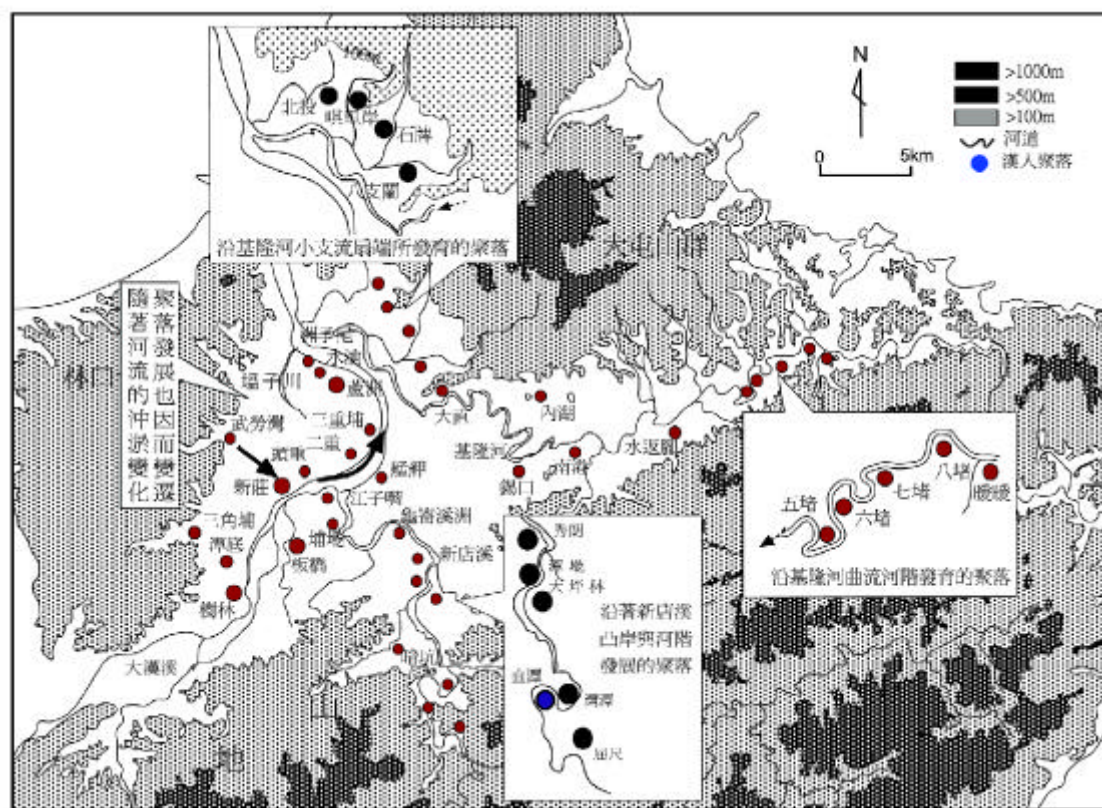
台北盆地的西北部因地勢較低，故早期仍是汪洋一片的大湖，而在三大支流不斷地沖淤之下，土地才漸次浮露，成為先民闢野拓荒的落腳處。以大漢溪沿岸的開發為例，昔日河道未經整治，擺移繁複、變遷不定、洪氾頻仍乃為河川的共同特性。但河流氾濫夾帶泥沙所增生的土地，屬氾濫平原(flood plain)的一種地貌，因是近河的平坦沃地，灌溉和耕作便利，雖適合農墾但不利定居，故早期離台北湖較遠、淹水較少的盆底邊緣地區，如樹林與新莊等近河聚落便優先成為漢人選定開墾與居住的家園(圖五)，然而這些聚落依然常因河川改道、洪水摧殘而不得不設法防堵，甚或遷徙避災，所以其地名亦透露著適應周遭地形環境而居住的事實。例如樹林一帶原是臨大漢溪而建立的聚落⁷，附近河道氾濫所衍生的自然堤(natural levee)不僅提供居所的保障，而這些地勢較高的沖積沃土也容易長出一片綠意成蔭的茂林，於是樹林一詞

表五 台北地區聚落命名與周遭地形特徵相關舉隅

區域地名	所屬鄰近地名的意義與代表之地形特徵
大漢溪流域	樹林：潭底 河川氾濫所形成的後背溼地。崙仔 河岸的風積沙丘地。溪墘厝 河旁平坦地。三角埔 出谷口的小沖積扇地。新莊：中港厝(塹仔堀) 河川旁之低濕湖沼。埤角 位居水埤的邊角位置。三重：三重舊名為三重埔，是因淡水河滑走坡所增生的河埔地，依照其次序分別有頭重埔、二重埔和三重埔。溪尾 網流河道的末端。蘆洲：水湳 低陷濕地。洲子尾 河中沙洲地的末端。溪墘 河岸埔地。
基隆河流域	噶里岸 海灣。八芝蘭 扇端泉水湧出帶。天母三角埔 谷口沖積扇。士林洲尾、溪洲底 河中洲末端。士林湳仔 河流氾濫的低濕地。大直 基隆河曲流河道中較直的一段。內湖 低濕地或山腳湧泉凹地。水返腳 感潮河段終點。平溪 水流和緩處。
新店溪流域	板橋：港仔嘴、江仔翠 大漢溪與新店溪兩河交匯口。埔墘、新埔 河岸埔地。湳仔、深坵 低陷濕地。溪洲 河中沙洲。沙崙 河岸沙丘。中永和：潭墘 氾濫原後背濕地。龜崙蘭溪洲 河中沙洲。南勢角 (枋寮)南邊的山腳地帶。中坑 兩坑之間的坑谷。圓山仔 圓形山丘地。新店：安坑(暗坑) 幽暗的河谷。大坪林 茂盛林木的平坦河階地。灣潭 曲流河道之處。直潭 曲流河道轉直之處。屈尺 此處河道狀似彎曲之尺。青潭 河道清澈的溪谷。塗(土)潭 河道污濁的溪谷。深坑：深坑 河道深切的幽邃河谷景觀。土庫 沃土可產米糧成倉之地。石碇：石碇 河中散布的礁石。烏塗窟 幽闇的坑谷。小格頭 兩溪分水嶺的小山丘。

參考資料：安倍明義(1987)、洪敏麟(1980)等

⁷ 大漢溪昔稱為大嵙崁或大姑陷(Takoham)溪，當地平埔語意即澎湃之大水。



圖五 台北地區聚落分布位置與環境關係圖

的地名因而傳開；而乾隆年間，來此開墾的漢人為了保護水圳的堤岸，更在堤岸上種了許多林木以固堤防洪，這也成了本區另一地名傳說的由來。所以在何種地勢條件下，才能確保聚落的安全性與穩定性是先民移墾開發的重要參考憑藉，也是生存所依附的主要價值取向所在。此外，區內的潭底、崙仔和溪墘厝等聚落名稱，亦代表聚落位居於後背溼地(slough)、河岸沙丘(dune)和河埔新生地的河岸地形景觀，今昔對照，說明以初墾聚落名稱作為該地原有地貌特徵的推斷模式，深具指標意義。新莊地區因位居泰山山腳的平野地帶，為面河背山的沖積平原與低位河階地，資源充沛、開墾便利，先前即有平埔族武勞灣社在此定居，清康熙年間漢人也來此開墾，並與這些平埔族比鄰而居。鄰近平埔族部落，除了貿易因素的考量外，該地優良的地理形勢自然成為人類選址的共同條件；雍正五年，平原上已建有「興直莊」、「興仔莊」等漢人村落⁸，又此區因是海山地區(鶯歌、三峽)入盆地之要衝，故也稱為海山口，乾隆十六年經由龜崙嶺(龜山)通往桃園的新路開通後，新莊因居大漢溪流域中段的水陸交通要津，區位功能日益彰顯，而聚落也漸遷至沖淤所成的河灘高地。由於當時此區水深港闊加上南北物流的送返，故千帆輻湊，商賈聚集使新莊成為當時盆地的一大熱鬧街市。然而大漢溪的網流河道擺移不定，也促使街市與聚落不斷遷徙更動，嘉慶末年更因河道淤淺，港口機能衰退，船舶轉停至下游的艋舺，使新莊繁華褪盡，一度漸趨沒落。

⁸ 新莊地名由來有二：1.興直莊的轉化(興與新發音近似)；2新的武勞灣莊簡化而來，本文所引用之台北相關地名原由，多參考自安倍明義(1987)與洪敏麟(1980)之文獻。

接鄰新莊的三重舊名為「三重埔」，埔是指平坦地勢；從地形來看，三重一帶的位置乃為河岸曲流的滑走坡(slip-off slope)，因離深水線和流心線較遠，流速較慢漸漸產生沉積作用形成凸岸，且不斷往下游處增生新月狀土地，所以早期本區的發展是在新莊聚落東邊附近的所謂頭前埔(一重埔)地區，登岸並建成聚落，而後隨泥沙沖積所成的沙洲也日漸擴大，東北緣(下游)的二重埔、三重埔的河埔新生地逐漸浮露且陸化完成，此時頭前埔卻因泥沙淤積嚴重再也無法靠泊船隻而停滯開發，故開墾的順序也移往二重埔和三重埔，最後三重埔則因地理位置鄰近台北大稻埕，交通和經貿的發展使三重聚落日後得以進一步躍升和發達。至於更下游的蘆洲舊稱為河上洲，顧名思義乃為河中沙洲(sand bar)，當時山腳斷層陷落帶的塢子川、淡水河下游與基隆河匯流一帶仍是河道分歧、洪氾頻繁、蘆葦叢生的低濕地，無法開發利用，尤其康熙年間地震所形成臺北湖塌陷，更嚴重影響其開闢，雖然乾隆年間有嘗試性地招佃拓墾⁹，但受水患所擾成效不彰，遲至嘉慶初年地層沈陷緩止，地勢淤積漸高，才有泉州移民入墾，而後隨著水圳與排水系統的建立，聚落陸續出現，水滴庄和洲子尾庄等地名的出現，亦均陳指著當地聚落鮮明的形勢與位置。

基隆河從八堵以下由高聳的山脈陡降至低平的谷地，因流速變慢、坡度變緩，夾帶的沙泥迅速堆積，河道也蜿蜒成自由曲流(free meander)的型態；至關渡入淡水河地帶更是泓森的湖沼，所以一遇颶風豪雨，河川宣洩不及、湖水高漲漫溢，洪氾遍野、積潦千頃，所以早期的開發並不順遂。從聚落的位置可以清晰發現當時漢人拓墾的路線均是沿著盆緣大屯山區的小支流流出山谷的小沖積扇地(如北投溪、磺溪和雙溪)，迂迴溯進基隆河岸開墾，而這些地區重疊了當時平埔族的生活領域與居住空間，亦間接證明基隆河水患的嚴重與古台北湖殘存的事實。在早期開發的地區如干豆(關渡)、北投、唎里岸、八芝蘭(士林)等都是沿平埔族的社名做為聚落名稱，當時平埔族利用這些沿著盆緣的山腳緩坡地與基隆河支流作為定居之所有幾個重要的原因：一是這些小支流谷地相對的地勢較高、水位較穩且遠離盆內河湖氾濫的侵擾，取水容易卻能減少水患，符合近水而不鄰水的環境選擇；二是面河背山，資源充裕，漁獵俱便，且這些位居小河沖積扇扇端的聚落，泉水無缺，提供原始定耕農業的有利基礎。所以漢人在移民初期自然也看中這些環境優點與平埔族已局部開發之地利，於是透過贖墾、買賣與其他方式逐漸兼併或取代這些平埔族的聚落與土地，這也是早期漢人初墾聚落大多沿用原住民社名的主因。此外，從開墾的軌跡來看，當時漢人沿基隆河入墾盆地，刻意避開了劍潭以東的大直至錫口(松山)間曲流最發達的地段，而直接躍入南港與水返腳(汐止)等地處東北盆緣山腳移墾，間接證明當時基隆河從劍潭以西是汪洋一片的湖盆，渺無人跡，以東的河道也因彎曲多折，排水不暢，漲濫頻繁，加上濕沼廣布的地形，瘴癘穢疾四伏，不利於定居農墾，所以乾隆初期以前，此區只有零星的原住民部落散居在此。

基隆河由水返腳至暖暖的河段，沿著東北 - 西南向的八堵向斜軸(亦為台北斷層線谷)發育為走向河(subsequent stream)，因曲流發達河谷甚為寬闊，河谷兩側為大武崙丘陵和南港丘陵對峙；基隆河因回春下切，在此形成嵌入曲流(intrenched meander)(林朝榮，1959)，曲流半島成臨河的低位河階地(FT)，這些寬坦的河階地，距水面又有一定崖差的安全屏障，所以適合聚落的建立，五堵、六堵、七堵與八堵等漢人村落便是循此依序在此拓墾。「堵」原是漢民族入墾時用來防禦原住民襲擾的堵垣，所以利於防守的地勢或位置常設置隘堵，以保障內部村民生命與財產的安全。隨著漢民族離開盆地，不斷深入基隆河系的山區拓展，自然進入原住民的勢力範圍，所以防範的措施也重要了起來，當時從汐止往上游接連連有一到

⁹ 蘆洲舊稱為河上洲，或有人亦稱和尚洲、鷺洲，因相傳清乾隆年間，竹塹(即今新竹)城隍廟僧侶梅福，向官府稟請以現今水滴村一帶產業為關渡媽祖廟之業產獲准，每年來此徵收租穀，於是鄉里百姓稱為和尚洲，又沙洲上常有鷺鳥成群駐足故又稱鷺洲。

四堵，這些利用天險所建立隘堵，因缺乏腹地發展，防禦意義大於開墾價值，故地名也隨著拓移後喪失原功能而消泯。等到漢人逐步推移至五堵一帶時，形勢豁然開朗，寬坦的凸岸河階提供農業和居住的優良條件，於是沿著這些基隆河谷曲流所形塑的塊狀河階地，陸續墾成了五堵到八堵，並貫通盆地至基隆海港的交通走廊，誘使台北往東區加速發展。故這些地名的陳列，不僅能透露出當時聚落的環境特性，也進一步勾勒出漢族先民開發的時序與方向。

新店溪沿岸的聚落拓墾模式亦十分類似，盆地平原主要的聚落選址多位在河流滑走坡的舌狀地帶，例如板橋、中永和與新店等地帶；而山區河谷則易在曲流的河階地形成聚落如大坪林、安坑、灣潭、直潭、屈尺和坪林等，這些地點都是屬於河流沖淤的平坦地，自然是人類居住的優良場所。以板橋為例，板橋位於大漢溪與新店溪的交會處，屬典型的沖積河埔新生地，相傳康熙時期已有漳人賴姓一族入墾，當時此區仍是蠻荒之地，入墾時的居民自然與平埔族比鄰而居，開發疏散且緩慢，直至乾隆年間才因水利設施的改善，灌溉和排水系統的建立，使漢人勢力在此區急遽拓展開來，包括深坵、埔墘、溪洲、湳仔、新埔、港仔嘴等聚落的興起也均能反映出與周遭地形環境的相關。中永和聚落的初始選址也不脫地形的依賴或鄰近平埔族的地緣關係，以永和最早開發的三個庄落為例，龜崙溪洲與潭墘分別位於新店溪南邊凸岸的北緣與東緣，均具河運交通與取水灌溉之利，而秀朗庄則是沿用昔日平埔族秀朗社地名而來，因為位置的優越性和已開發的便利性，所以如同許多原住民的聚落一樣，容易被漢人優勢文化的入侵並取代。新店溪與支流景美溪的交流處附近有比高約十餘公尺的紅壤河階地(LT)發育，因地勢平緩，其上林木蓊鬱，所以稱為大坪林(洪敏麟，1980)，此地因遠離洪患，又容易開發，故雍正時期便有漢人沿溪至此開發。支流安坑溪一帶原稱暗坑仔，地名的原因乃是因安坑溪下切侵蝕劇烈，不僅河谷陡深，兩岸亦形成數段河階，當時因兩岸階地林木茂盛加上坑谷深窄，終日幽暗，故名暗坑仔。安坑因位置和地理環境因素，開發較遲，道光年間才有正式的開闢，公館崙和柴埕聚落名稱代表著官有地和林木資源的採集活動，而往上游的頭城至五城等五庄的拓墾歷程，也刻畫出當時開墾的順序與艱辛¹⁰。至於新店溪主流進入山區至龜山間的流路間，同樣也因侵蝕基準下移，河蝕下切旺盛，造成成育曲流(ingrown meander)，凸岸所發育的河階平坦地上如新店、灣潭、直潭等地便容易被選為聚落的位置，局部地區如屈尺、廣興則因發生切斷曲流形成所謂離堆丘(umlauferberg)，聚落便選址於離堆丘上，所以不論原住民或後來移入的漢人，近水又能避免洪水侵擾的平坦地形，均是最適合居民的落腳之處。

地名可以還原當時的地景，而所在的位置也能詮釋所在的環境特色。故由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漢人在早期開發的過程中，聚落的地點選擇與發展興衰是緊依附著自然環境，特別是良好的地勢與位置，如近河的浮露埔地、氾濫原區、河中沙洲、河階地、河流的匯合處、凸岸滑走坡及沖積扇端等地，往往是聚落選址的優先考量場所，而有些所在地的地形特色，也順理成章成為聚落命名的依據。所謂「福地福人居」所指的即是能滿足安全、灌溉和有利於生產活動的地勢，並能決定聚落的聚集規模及人口的密集程度。然而這樣的環境決定論，並無法維持一個聚落的長治久安，因為受限於自然條件的制約，所以一旦環境發生變化，如河道變遷、洪水氾濫、河灣淤塞、甚或地震山崩，聚落就將被迫跟著遷徙，因此聚落如何維繫與周遭環境的動態平衡，是初期聚落發展與否的關鍵因素。這種情形一直要等到生產方式與生產技術發生變革，資源利用的多元與進步，環境限制的條件逐漸卸除，墾民活動領域的逐漸擴大，對聚居地的選擇才有了更大的自由，這時的聚落除了擺脫依自然環境的命名模式而湧現許多與人文活動有關的地名外，區域發

¹⁰ 二城潤濟宮的中興碑文載：「茲我安坑內五庄，當未成庄以前，林密谷暗，山面一帶，兇蕃攀躐、風土未純，民履受困」內文彰顯當時原始地貌的特徵與先民初墾的艱辛。

展的整合歷程往往也導致聚落與城鎮地名的不斷更迭，所以聚落名稱存在於歷史的時間序列及其相應的環境形態中，不僅只是提供日常生活上的定位功能，同時也表現著一個地區當時環境背景的意涵，是故透過地名的探索與聚落的位置，可了解當時聚落的區域分布與型態特徵，對於自然環境、歷史變遷與語言文化的研究助益甚大，因此有人便稱地名為歷史的「活化石」。

從明末迄清末，漢人聚落已迅速散布在廣大的台北盆地及周圍地帶，這些聚落的分布到底具有何種特色？從上述的圖表與文字說明可以歸結出聚落的密度以盆地內的平原區最高，其次是盆地周緣的三大河谷地與林口台地區，而北海岸的沿海低地僅見零星的分布，尤其是大型的市街聚落均位在盆地平原內河岸地帶發展起來；這說明了聚落的型態、規模與發展是頗受地形因素的影響。而在一定高程的限制下，聚落對高度的選擇是稍具彈性的，只要地勢夠平緩，生產條件具備，分寸之地依然會有小型聚落的生成。故整體而言，盆地內寬廣低平的地勢環境，因具開發的便利性，所以容易吸引人口的集中與聚落的聚集，故大型聚落的型態十分明顯，而河谷平原與河岸階地也適合聚落的發展，許多零散的點聚落也往往併聯成為密度較高的集村聚落，但海岸地區、河川上游谷地及山區小盆地，平坦空間有限，聚落密度甚低，主要以散村聚落較常見。

五、結論

藉由以上各節的論述，本文可歸納以下幾點結論：

1. 明末以來，本區已有漢人、西班牙與荷蘭人開始於淡水、雞籠和北海岸等一帶活動，當時漢人聚落多屬零星發展。到了清康熙時期本區聚落主要分布在淡水河下游一帶，並漸次移入盆地，在河湖氾濫與平埔族環視的阻擾下，由西向東前行；乾隆時期由零散的點聚落漸沿三大河系連成線狀發展，其中社子以北與基隆河附近的開發較遲，可能與康熙台北湖和基隆河曲流易氾濫有關。
2. 乾隆時期，水圳與水利建設的陸續修建，代表著台北盆地由原住民漁獵游耕的生活舞台，轉化成漢人農業定耕的田園景觀，也意味著初墾階段的結束與漢人勢力的確立。這時漢人聚落的位置已經擺脫昔時對河系的依賴，而是藉由圳道開鑿，轉向廣袤的平原延伸，使盆地內的聚落由點線發展成網格狀交錯聯繫。許多新興聚落如三張犁、五分埔等處，漸漸使用與農墾活動或人文主題相關的地名稱呼，代表聚落選址也漸從自然環境的條件限制中掙脫出來，墾民已能利用技術改變自然條件來因應居住與生存所需。
3. 嘉慶道光年間，盆地之中心地帶多已開發完成，當時移入之漢人便沿三大河流支系上溯至盆緣山區繼續進行拓殖，故發展模式是以盆底中心帶向周圍山地成輻射狀線的延展。到了清末聚落發展的重點是大型街莊的建立與各聚落網絡間的縱橫連結，聚落從單純的各別散村型態，局部整併成為商業城鎮，聚落的發展轉向產業與交通等人文條件掌控，都會結構與機能日趨完善，漸將台北推昇為全台的首善之都。
4. 聚落名稱，不僅只是提供日常生活上的定位功能，同時也表現著一個地區當時環境背景的意涵，隨著時空變遷，聚落命名也常有更迭。是故透過地名的回溯和探索，可了解當時的聚落分布特徵與及周遭環境的互動情形。漢人在初墾時期，面對一片荒煙蔓草的未知地區中，對地名認別的最便捷的方法便是襲用當地原住民的稱呼，此外因聚落選址是趨向已開發的便利性與地形位置的優越性為主要考量根據，所以一開始漢人聚落多分布於平埔聚落的舊社鄰近，透過墾墾、買賣與其他方式逐漸兼併或取代這些平埔族的聚落與土地，這也是早期漢人初墾聚落大多沿用原住民社名的主因。
5. 因為地形特徵通常規模較大、型態明顯且保持較久，故直覺上容易以地形特徵作為最初地名的命名，以

利記憶。所以許多以自然環境做為聚落名稱中，依所在地形特徵或位置作為命名的，實居多數。故追溯一些以地形特徵命名的聚落來加以分析，有助於了解地形特徵對於漢人在本區拓墾模式和聚落選址有何種程度的影響。例如蘆洲舊稱為河上洲，顧名思義當時其聚落位置是在河中沙洲發展出來的，大直所在位置是彎曲的基隆河中，河道較直的一段。而新店安坑原稱暗坑仔，乃此地溪流下切侵蝕劇烈，兩岸階地林木茂盛加上坑谷深窄，終日幽暗故名暗坑仔。而板橋的江仔翠昔稱港仔嘴，意即位處大漢溪與新店溪兩河之交匯口。

6. 此外聚落所在的位置亦能反映地理環境變遷，例如當時的新莊因大漢溪河道變遷使港口機能衰退而沒落，三重則因河川積沙的陸埔而發展。又干豆(關渡)、北投、唼里岸、八芝蘭(士林)等都是沿著盆緣的山腳緩坡地與基隆河支流出口作為定居之所，這些聚落位於小河沖積扇扇端，除了考量水源充足，有利農業發展外，因其遠離主河道，也間接證明基隆河下游水患的嚴重與古台北湖殘存的事實；而中游沿河階地發展的五堵到八堵等聚落，不僅能透露出當時聚落依存近水的環境特性，也進一步勾勒出先民開發的時序與方向。另外新店溪在盆地內的聚落選址多位在河流滑走坡的舌狀地帶，例如板橋、中永和與新店等地帶，而山區則易在河谷階地形成聚落如安坑、灣潭、直潭等。這說明漢人在早期開發的過程中，聚落的地點選擇與發展興衰是緊依附著自然環境，特別是良好的地勢與位置，如近河的露浮埔地、汜濫原區、河中沙洲、低位河階、河流的匯合處、凸岸滑走坡及沖積扇端等地，往往即是聚落選址的優先考量場所。
7. 整體而言，漢人入墾台北地區，一如人類早先殖移的經驗模式，天然的港灣與河口是登岸的前哨站，而初墾聚落的地點(site)選擇則是緊依附著自然環境，特別是良好的地勢與位置，如近河的浮露埔地、汜濫原區、河中沙洲、河階地、河流的匯合處、凸岸滑走坡及沖積扇端等地勢；這些選址位置隨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調整，且多與原住民棲息生活之處重疊，此點說明了儘管人類聚落的組合形態、功能結構有異，但地形條件的制約性促使聚落的分佈特徵具備了共同性，也有助於解釋聚落遺址研究所謂文化層的堆疊現象。

然而由於聚落所提供的居民活動須與其環境承载力相對應，所以聚落的發展規模受限於生態環境、資源供給、交通運輸與腹地範圍等區位(location)因素甚深。有別於原始聚落的模式，漢人的水田文化帶來精緻農業與灌溉科技，並轉化聚落對自然條件的傳統依賴，故凡能滿足安全、灌溉和有利於生產活動的平坦地勢，無障礙地均是聚落選址之所，而決定聚落的聚集規模及人口的密集程度，是以人文要素為主要考量的區位網絡，沖積盆地與河岸階地適合聚落進一步地發展，許多零散的點聚落往往併聯成為密度較高的集村或市街，海岸地區、河川上游谷地及山區小盆地，平坦空間有限，區位機能不彰，聚落密度甚低，主要以散村聚落較常見。

六、參考文獻

《中文部份》

- 尹章義(1989)：台灣開發史研究，台北：台北聯經出版公司，590頁。
- 王秋原(1968)：台灣新店溪之地形及其流域聚落之發展，國立臺灣大學地理學系地理學報，5：115-125。
- 王國璠(1981)：台北市發展史(一)，台北：台北市文獻會，401頁。
- 石再添、蔡文彩等(1987)：台灣地理概論，台北：台北中華書局，214頁。

- 石再添、鄧國雄、黃朝恩、張瑞津(1977)：濁大流域的聚落分布與地形之相關研究，台灣文獻，28(2)：75-93。
- 石再添、鄧國雄等(1981)：台北市發展史地形篇，1：247-255。
- 安倍明義(1987)：台灣地名研究，台北：武陵出版社，236頁。
- 余文儀(1962)：續修台灣府志，台灣文獻叢刊74，台銀經濟研究室，118頁。
- 吳育臻(1988)：新竹縣大隘三鄉聚落與生活方式的變遷，台北：臺灣師大地理研究所碩論，175頁。
- 吳建民(1991)：台灣水庫之泥沙問題，水庫集水區經營研討會論文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編印：3-18~3-33頁。
- 吳健蘭、張政亮、鄧國雄(2002)：大台北地區史前聚落分布與地形之相關研究，中國地理學會會刊，30：141-161。
- 李文良(1999)：中心與周緣：臺北盆地東南緣淺山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台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印行，232頁。
- 李水城(2002)：環境與聚落的演進，考古與文物，6，總134：33-38。
- 周鍾瑄(1992)：諸羅縣志，。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300頁。
- 林克夫(1954)：台北市的埤和圳，臺北文物，4：66-68。
- 林明聖(1998)：談康熙台北大湖神話，臺灣之第四紀第七次研討會論文集：63-67。
- 林朝榮(1959)：台灣地形，台灣通志稿卷一，土地志地理篇，台北：台灣省文獻會，424頁。
- 林朝榮(1966)：概說台灣第四紀的地史並討論其自然史和文化史的關係，考古人類學刊，28，7-14。
- 施振民(1973)：祭祀圈與社會組織：彰化平原聚落發展模式的探討，中研院民族所集刊，36：113-140。
- 施添福(1987)：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台北：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叢書第15號，210頁。
- 施添福(1994)：蘭陽平原的傳統聚落及其人文生態意義，空間，62：2104-107。
- 洪敏麟(1980)：台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466頁。
- 洪敏麟、陳漢光、廖漢臣(1969)：臺灣堡圖集，台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428頁。
- 胡振洲(1977)：聚落地理學，台北：三民書局，223頁。
- 郁永河(1983)：裨海紀遊，臺灣文獻叢刊第46種，台北：成文出版社，72頁。
- 翁佳音(1984)：平埔族漢化史考略，台灣風物，34(1)：1-27。
- 翁佳音(1998)：大台北古地圖考釋，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200頁。
- 張炎憲等編(1996)：台灣近百年史論文集，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573頁。
- 盛清沂等編纂(1960)：台北縣志，臺北：臺北縣文獻委員會，28冊
- 莊永明(1991)：台北老街，台北：時報出版社，223頁。
- 郭薰風、石璋如(1983)：桃園縣志，台北：志文書局，260頁。
- 陳正祥(1959)：台灣地誌，台北：敷明產業研究所，1360頁。
- 陳培桂(1984)：淡水廳志，台北：大通書局，484頁。
- 陳朝興(1984)：西元一九四五年以前台北市城市形式轉化研究，台北：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碩論，203頁。
- 富田芳郎(1955)：臺灣鄉鎮之研究，臺灣銀行季刊，第17冊，3：85-105。

- 程大學(1991)：台灣開發史，台北：眾文書局，296 頁。
- 黃世孟(1989)：從台北都市計畫歷史發展探討空間結構變遷特質之研究，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學報，4：67-83。
- 新莊市志編輯委員會(1998)：新莊市志，新莊市公所發行，503 頁。
- 溫振華(1981)：台北市發展史，第五章開闢，台北市文獻委員會：905-947。
- 詹素娟、劉益昌(1999)：大台北都會區原住民歷史專輯，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295 頁。
- 廖春生(1988)：台北之都市轉化以清代三市街(艋舺、大稻埕、城內)為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碩論，157 頁。
- 綿貫勇彥(1933)：聚落地理學，日本東京：中興館，254 頁。
- 劉良璧(1961)：重修福建台灣府志，台灣文獻叢刊 121，台銀經濟研究室，314 頁。
- 劉濱誼(1996)：人類聚居環境學引論，城市規劃彙刊，7：27-31。
- 鄧國雄(1998)：大台北古地圖考釋書評，北縣文化，台北縣立文化中心，58：26-37。
- 謝英宗(2000)：康熙臺北湖古地理環境之探討，台灣大學地理學系地理學報，27：85-95。
- 《西文部份》
- Fellman, J., Getis, A., & Getis, J. (1990): Human geography: Landscapes of human activities. Dubuque: William C. Brown. 566pp.
- Gilbert, A. (1988): The new regional geography in English and French-speaking countri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2: 2, 208-228.
- De Blij, H.J. (1996): Human Geography-Culture, Society and Space ", Sixth Edi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608pp.
- Rubenstein, J.M. (1992): The cultural landscape: An introduction to human geography. New York, NY: Macmillan. 517pp.
- Haggett, P. (1983): Geography-A Modern Synthesis, Revised Third Edi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627pp.
- Hart, J. F. (1982): The Highest Form of the geographer's Art, A. A. A. G., 72:1-29.
- Liu, P. H. (1963): Excavations and Discoveries at Tapenkeng and Other Prehistoric Sites of Pali District,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Maruszczak, H. (1997): Changes of the river cours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lood plain terraces in the border zone of the south-Polish uplands and middle-Polish lowlands in historical times. Landform Analysis 1: 33-39.
- Silbernagel, J., Martin, S.R., Gale, M.R., Chen, J. (1997): Prehistoric, historic, and present settlement patterns related to ecological hierarchy in the Eastern Upper Peninsula of Michigan, U.S.A. Landscape Ecology 12: 223-240.

收稿日期：93 年 2 月 12 日
修正日期：93 年 4 月 28 日
接受日期：93 年 5 月 10 日